

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第二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史志康 等 / 译



散文作品
1820年—1865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I712.09/6

:2

2008

剑桥美国文学史

第二卷

〔美〕萨克文·伯科维奇 / 主编
史志康 等 / 译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散文作品
1820年—1865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06-324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ume 2

Edited by Sacvan Bercovitch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本书全球简体中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 (美) 伯科维奇 (Bercovitch, S.) 主编;
史志康等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211-568-2

I. 剑…

II. ①伯…②史…

III. ①文学史—美国 ②散文—文学史—美国—1820~1865

IV. I7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1536 号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二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苗永姝

责任印制: 尹 璠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www. cctpbook. com

E- m a i 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970 千字

印 张: 56.75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中文版序

能够把这部美国文学史介绍给中国读者是莫大的荣幸——这种荣幸标志着两种文化富于戏剧性的会合。美国文学传说也许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而中国文学传说则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美国文学在一个方面却比较年长：它是现代世界所诞生的第一个国家的产物。当然，在欧洲定居者到达以前，美国印第安人（或称土著美国人）已经在今天叫做美国的这片领土上居住了数千年之久，但是他们拥有的是口头文学而不是书面文学。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美国文学传统基本是使用英语的作家们的产物。它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最初是由英国殖民者撰写的，它是这些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先驱们创作的记叙文、布道文、日记和诗歌。19世纪，它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在大西洋两岸的胜利而繁荣兴旺；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作为自由主义、自由经营和市场开放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学依然经久不衰。

美国文学发展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历史悠久、方面众多、异彩纷呈的中国文学统一得多的作品主体；在对现代性的种种状况进行表述方面，它也是世界上年代最长久、内容最复杂的民族文学。它是一种富于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文学，一种扩张和探索的文学，一种蕴涵种族冲突和帝国征服的文学，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文学，一种反映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和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从探讨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探讨异化、歧视、城市化和地区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它们受到一种民主美学的启迪（与人们所理解的那种欧洲“旧世界”的精英统治论针锋相对）——这是一种“普通人”和“寻常事”的美学；不同凡响的是它们对建立在奴隶制、土地的剥夺和资本主义的贪婪等基础上的文化犯下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持续的批评（这种批评往往成为激烈的谴责）。最后，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文学：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未来的土地，“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折磨，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痛苦的焦虑。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中国的概念是一个关于悠久历史的问题——关于绵延数千年之久的各种神话、传说和事件的问题。而美国作家所



一心追求的是重新创造自己身份这个含义深刻的现代主义问题。

自 19 世纪初以来已有几部美国文学史问世，但是其中鸿篇巨制之作只有三部。这三部文学史实际上记录了美国的成长历程。第一部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7 年，当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初露锋芒；第二部面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 1948 年，当时美国充分展现了其经济和军事大国的实力。我们这部文学史是 20 世纪末叶全球化的产物，此时民族主义的含义本身已经受到质疑，在美国，对文化内聚力的一些基本说法有了一种新的、批判的意识。

这种新的意识表现为两种形式，即历史的形式和知识的形式。在过去 30 年间，学者们揭露了这个国家历史上受到压抑或者被人忽视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和少数民族作品的重要性，非裔美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域”作家们诸多贡献的重要性。我们也已经认识到某些包罗万象的概念（包括“美国人”和“文学经典”之类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美国的生成过程，毋宁说是掩盖了这一过程。在知识方面，我所说的新意识与文学批评中心权威的崩溃密切相关。过去的 30 年是众多激烈竞争的理论 and 批评流派繁荣兴盛的年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这部八卷本美国文学史是第一部着力展示一个意见分歧的时代而不是特意表述一种正统观念的巨著。我们无意一劳永逸地为千秋万代提供一篇关于美国文学的故事；我们无意佯称发现了我们国家文学传统发展独一无二的真正关键。恰恰相反，这部文学史代表了一代美国学者的独特观点（一种多元主义，有时互相矛盾，常常变化无常的观点），一种已经从本质上对这个领域的边界加以拓展和重新确定的观点。

因此这部文学史采用了与以前几部文学史不同的格式。我在本书的序言里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差别。为了适合这篇序言的目的，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关于分歧的问题。此前几部文学史不是基于有关文学、历史及其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有撰稿人一致赞同的文学—历史共识），就是基于权威“文学史名家”的某种宏论。而这两种选择对我们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如上所述，我们这部文学史反映了多种多样的评论方法和途径，其中不乏互相矛盾之处，但是每一种方法和途径都代表着当前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有关我们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专论）不同寻常的篇幅。以前所有合作编写的文学史都要求专家就有关主题撰写较短的文稿：例如用 15 页篇幅论述南方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用 5 页篇幅论述清教徒诗人安



娜·布拉兹特里特，用30页篇幅论述18世纪启蒙主义散文。然后编辑们再将这一切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每一位撰稿人都可以要求用足够的篇幅对他或她所采取的特殊途径进行解释。仅仅“充分地论述这个题目”（涵盖各种文本、运动和体裁等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不同见解的形成，其中每一种见解都是专家的声音，然而对于声称代表最终的权威又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在每卷里提供的都不是一系列权威性的宣言，而是一组各不相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叙述；它们一起构成了两种这个时期具有连贯性的对话式记叙文——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记叙文，其中的各个部分多彩多姿，有助于增进全书的深度和广度。

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读者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各具特色的美国文学史专家对话，而与此同时，这些专家将就书中讨论的不同专题为他们提供内容最为丰富的论述。我们希望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中国学生不仅可以从阅读中获益，而且可以从中受到激励，用新的方式对美国文学进行思考，并且从总体上对文学研究进行思考。

萨克文·伯科维奇

致 谢

主编寄语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惠赐一笔款项，它使本书全体撰稿人得以汇聚一堂，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讨论与构思。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朱莉·格林布拉特（Julie Greenblatt）和 T. 苏珊·张（T. Susan Chang）给予了慷慨的帮助；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艾顿·伯科维奇（Eytan Bercovitch）和苏珊·L. 米兹卢奇（Susan L. Mizruchi）给予了不懈的支持和实在的建议；南希·本特利（Nancy Bentley）、迈克尔·伯特胡德（Michael Berthold）、兰纳·法布（Lianna Farber）和杰西卡·里斯金（Jessica Riskin）以学生的身份给予了我必要的帮助，在此，我一并表示谢意。我还特别感谢玛格里特·里德（Margaret Reid），是她在本书形成的每个阶段都给予了帮助。

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

副主编寄语

乔纳森·艾阿克（Jonathan Arac）和戴维·S. 希尔德（David S. Shields）在编撰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大事年表时给予了特别的帮助；帕姆拉·布鲁顿（Pamela Bruton）和苏珊·格林伯格（Susan Greenberg）对稿件进行了一丝不苟的修改；凯撒利塔·拉马扎（Katharita Lamoza）对成书过程进行了耐心而又在行的监督；朱莉·格林布拉特与 T. 苏珊·张在这个项目各个不同阶段都给予了无法估量的宝贵帮助；伊莉莎白·法欧勒（Elizabeth Fowler）也不吝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和有价值的建议。在此，我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塞洛斯·R. K. 帕泰尔（Cyrus R. K. Patell）



文学职业化的背景

我要感谢“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所给予的1986年夏季薪俸，以及威廉斯学院那年秋季给予的学术休假。他们的支持确保我有关键的时间来研究和完成我在该卷中所撰写的大部分内容。同时，我也感谢威廉斯学院图书馆的全体成员，他们迅速地为我办理了跨馆借阅手续。我还想向其他一些学者表示感谢，他们为我撰写的部分以及由我负责的该卷的文献目录提供了帮助。我要特别感谢佩里·米勒（Perry Miller），是他最先向我介绍了很多我要讨论的书籍和作者，以及威廉·查瓦特（William Charvat）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在他去世后以《美国的著作职业——从1800年到1870年》（*The Profession of Authorship in America, 1800—1870*）编辑出版的完成和未完成的论文。

vii

迈克尔·达维特·贝尔（Michael Davitt Bell）

扩张与种族的文学

在此我谨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文研究会以及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对全书的整体设计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我深为感激。我也感谢保拉·古恩·爱伦（Paula Gunn Allen）、理查德·布里奇曼（Richard Bridgeman）、诺曼·格拉博（Norman Grabo）和凯尼斯·林肯（Kenneth Lincoln）对书稿的各个部分所提的意见。此外，我还想感谢安德鲁·布朗、塞洛斯·帕泰尔、朱莉·格林布拉特和T. 苏珊·张的宝贵的帮助。

本书得益于很多二手资料，我要在下面列出部分书目：

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

罗伊·哈维·皮尔斯：《野蛮主义和文明：印第安人和美国思想研究》（修订版），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5；

威廉·H. 戈兹曼：《探险与帝国：征服美国西部过程中的探险家和科学家》，纽约：诺顿，1966；

理查德·斯洛特金：《暴力中的新生：1600—1860年的美国边疆神话》，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威斯莱昂大学出版社，1973；

尤金·D. 热诺维斯：《摇摆吧，乔丹，摇摆吧，奴隶创造的世界》，纽约：潘泰翁，1974；



雷吉诺·豪斯曼：《种族及命定扩张说：美国种族盎格鲁—萨克逊主义起源》，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

本书有关非裔美国人蓄奴制度的材料部分来自1983年的一篇文章。此文先在英语研究院宣读，后以《蓄奴制、革命与美国文艺复兴》为题收入瓦尔特·本恩·迈克尔斯和唐纳德·皮斯主编的《美国文艺复兴新探》（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5，1—33页），其中一些段落还糅进了拙著《唤醒众民族：美国文学形成中的种族》（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关于美国印第安人那一章的部分内容曾以《印第安长廊：南北战争前期的文学以及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抑制》为题收入比弗利·沃洛欣主编的《美国文学、文化和意识形态：亨利·纳什·史密斯纪念文集》（纽约：彼得·朗，1990，37—64页）。

viii 扩张文学部分开头所引马扎诺·巴列霍的《上加利福尼亚历史和人物的回忆》中的文字取自班克洛夫特图书馆所藏的厄尔·R. 海威特的译本，而《格雷高里奥·科特斯之歌》则取自阿美里科·帕雷德斯的《枪在手中：一首边疆歌谣及其主人公》（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58）。美国印第安人口述传统及演讲术部分所引材料则受惠于一些二手资料。其中一些引文有不同译本，见于下述著作及文中所引的南北战争前期著作中。文中所述的现代文集大抵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一些材料的重印或调整。“红外套”和“花斑蛇”的演讲见于萨姆尔·G. 德雷克所著《北美印第安人史传》（波士顿：B. B. 穆塞，1851）；怀特·安特洛普的抒情歌谣的记述见于乔治·伯德·格林纳尔所著《战斗的沙伊安人》（初版于1915年，重印于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56）；波尼人创世故事见于纳塔利·科蒂斯·博林所著《印第安人的书藉》（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23）；首先见于普利尼·厄勒·哥达德的《纳瓦霍文本：美国博物学博物馆人类学文献》（卷34，纽约，1933）的《黑熊之歌》，首先见于弗朗西斯·拉夫莱西的《奥塞奇部落：守夜仪式》（美国民族学局第39份年度报告，华盛顿，1925）的《玉蜀黍之歌》，以及首先见于普利尼·厄勒·哥达德的《格塔尔：一种梅斯卡勒罗阿帕奇人仪式》（纽约：斯泰切特，1909）的该部落发育成长歌，都收入玛格特·奥斯特洛夫所编《羽蛇》（纽约：约翰·戴伊，1946；1962年由卡普里科恩书屋重印，改名为《美国印第安人散文与诗歌》，1992年又以《羽蛇：美国印第安人散文与诗歌》为名由毕根出版社重印）；《十只熊》、彼特莱沙罗、歆马顿·亚拉奇特以及《小鸟鸦》的演讲见于W. C. 万德沃斯编著《印第安演讲术》（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71）；西塞尔（西雅图）的演说及“红鸟”的死亡之歌收在托马斯·E. 桑德斯和威廉·E. 皮克主编的《美国印第



安人文学》(纽约:格伦科,1973);切诺基人和罗伊塞诺人创世故事以及纳瓦霍人的夜歌则见于格罗里娅·莱维塔斯、弗兰克·维维罗和雅克琳·维维罗主编的《美国印第安人散文与诗歌:我们在黑暗中等待》(纽约:G.P.普南特之子出版社,1974)。

艾里克·J.桑德奎斯特(Eric J.Sundquist)

超验主义

我谨在此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术理事会的研究委员会对本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提供的一年研究经费使我有时间开始这项工作,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供的学术年假则使我能完成本项目。感谢迪恩·格罗德增(Dean Grodzins)、加里·霍尔(Gary Hall)和罗伯特·佩林(Robert Perrin)允许我阅读他们未发表的西奥多·帕克、爱默生和丹尼尔·韦伯斯特研究手稿。迈克尔·科拉科西奥(Michael Colacurcio)和迪恩·格罗德增还阅读了本书稿的一部分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几位很有才华的研究助手——西比尔·布拉布纳(Sybil Brabner)、迪埃尼·伦丁(Deanne Lundin)和玛丽·弗洛里(Mary Flory)——在本章写作过程中给予我不少帮助。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三个人:我的先生保罗·谢兹(Paul Sheats)在本章写作的漫长过程中一直给我鼓励和支持;同事丹尼尔·卡尔德(Daniel Calder)在这个项目的启动上给了我极为宝贵的帮助;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T.苏珊·张给予我远远超出一般编辑所能给的帮助和支持。最后,我要感谢萨克文·伯科维奇邀请我参与这个项目并在我的写作中一直给我宝贵的建议,还有塞洛斯·帕泰尔,他给我提供了研究基金、通讯及参考文献上的帮助。

ix

在记述超验主义写作的过程中,我受惠于许多著作,在此无法一一致谢。下列书目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我所使用或受其影响的许多引文、史实和解释的来源。不少著作,特别是那些超验主义者个人传记的内容,不止出现在一章里,但一般只是在第一次引述时提到它们的名字。

“唯一理教的开端”借鉴了学者们对19世纪前几十年里震撼新英格兰地区的宗教和哲学论战以及那些开始改变文本权威性的国外古代文学及《圣经》文本批评的发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简列如下:

刘易斯·P.辛普森:《联邦文学思想:1803—1811年的“每月文选及波士顿评论”选集》,巴顿·路热: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2;



詹姆斯·金·摩尔斯：《吉德迪亚·摩尔斯：新英格兰正统信仰的捍卫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9；

康拉德·赖特：《亨利·威尔的选举：两种当代叙述》附评论，《哈佛文学公报》第17期，1969，245—278页；

安德鲁·德尔科班：《威廉·埃勒里·钱宁：论美国的自由精神》，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

康拉德·赖特：《美国唯一理教的起源》，波士顿：斯塔尔·金出版社，1955；

《宗教自由主义的三位先知：钱宁、帕克与爱默生》，康拉德·赖特作序；波士顿：毕根，1961；

莉莉安·韩德林：《毁灭巴比伦——年轻的安德鲁斯·诺顿》，见康拉德·赖特所编《1805—1865年的美国唯一理教》，波士顿：马萨诸塞历史学会及东北大学出版社，1989；

约瑟夫·亨利·爱伦：《我们在神学方面的自由运动》，波士顿：罗伯兹兄弟出版社，1882；

约翰·洛克：《论人类知性》，亚历山大·坎贝尔·弗雷泽主编，2卷，x 1894；重印于纽约：多佛，1959；

约翰·洛克：《基督教的合理性，并附奇迹论及论宽容的第三封信一部分》，I. T. 拉姆塞编辑、剪辑并作序；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8；

保罗·里维尔·弗罗森汉姆：《演说家、政治家爱德华·艾弗里特》，波士顿：霍夫顿，密夫林，1925；

丹尼尔·沃克·豪：《唯一理教的良知：1805—1861年的哈佛道德哲学》，修订第二版，有新序；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威斯莱昂大学出版社，1988；

丹尼尔·沃克·豪：《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剑桥柏拉图主义者》，见赖特所编《美国的唯一理教》；

麦莱尔·戴维斯：《爱默生的“理性”与苏格兰哲学家》，《新英格兰季刊》第17期，1944，209—228页；

大卫·发特·诺顿：《大卫·休谟：常识道德论者、怀疑主义玄学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

埃吉利·伍德曼·托德：《1817—1837年哈佛神学院的哲学思想》，《新英格兰季刊》第16期，1943，63—90页；

琳达·克伯：《持异议的联邦党人：杰斐逊时代美国的意象与意识形态》，



纽约州，依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0；

卡尔·迪埃耳：《1770—1870年的美国人与德国学术》，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8；

F. A. 沃尔夫：《荷马绪论》（1795），由安东尼·格拉夫顿、格莱恩·W. 莫斯顿、詹姆斯·E. G. 泽兹尔翻译、作序及注释；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

劳伦斯·博埃尔：《约瑟夫·史蒂文斯·巴克明斯特：一个新英格兰圣徒的成长》，《加拿大美国研究评论》第10期，1979，1—29页；

杰里·威恩·布朗：《1800—1870年间美国〈圣经〉批评的兴起》，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威斯莱昂大学出版社，1969；

伊丽莎白·赫思：《播下“颠覆”的种子：哈佛早期哥廷根学生》，见《美国文艺复兴研究》，1992，91—105页；

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自传、日记与通信》，爱德华·艾弗里特·黑尔编；波士顿和纽约：霍夫顿、密夫林，1891。

“抨击洛克”考察了美国对经验哲学传统的不满以及康德及后康德哲学的消息传到美国的各种路径。这部分资料包括：

弗雷德里克·鲁道尔夫：《必修课程：1636年以来的美国大学本科课程史》，旧金山：乔西—巴思，1989；

罗纳尔德·瓦尔·威尔斯：《三位基督教超验主义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3；

J. 克里斯托弗·赫罗德：《时代的女主人：斯塔尔夫人传》，纽约：哈姆尼书屋，1979；

约翰·J. 杜斐编：《柯勒律治的美国信徒：詹姆斯·马什通信选》，阿姆斯特：马塞诸塞大学出版社，1973；

约瑟夫·托利编：《神学博士雷夫·詹姆斯·马什遗作——附其生活回忆录》，波士顿：克洛克和布鲁斯特，1843；

约翰·J. 杜斐：《出版柯勒律治的问题：詹姆斯·马什的美国第一版〈沉思之助〉》，《新英格兰季刊》第43期，1970，193—208页；

约翰·克里夫：《苏格兰评论家：1802—1815年的“爱丁堡评论”》，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

约瑟夫·亨利·爱伦：《“我们的自由运动”余波》，波士顿：罗伯兹兄弟出版社，1897；

劳伦斯·博埃尔：《文学超验主义：美国文艺复兴中的风格与想象》，纽约州，依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3；



康拉德·赖特：《18世纪的美国理性宗教》，见《自由基督教徒：美国唯一理教史文集》，波士顿：毕根，1970；

拉尔夫·L. 拉斯克：《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9；

盖伊·威尔逊·爱伦：《沃尔多·爱默生：一种传记》，纽约：海盗出版社，1981。

“卡莱尔与美国超验主义的发端”分析了卡莱尔对波士顿学人的影响。这些年轻人热忱阅读卡莱尔19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在英国报刊上匿名发表但极易辨认的文章。这部分资料包括：

雷纳·韦勒克的两篇文章：《卡莱尔与德国浪漫主义》及《次要的超验主义者与德国哲学》，收入《碰撞：19世纪德国、英国和美国学术和文学关系研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

威廉·西拉斯·万斯：《卡莱尔在〈重新修补的裁缝〉前的美国》，《美国文学》第7期，1936，363—375页；

约瑟夫·斯拉特：《乔治·里普利与托马斯·卡莱尔》，《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第67期，1952，341—349页；

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致玛格里特·富勒的信件》，约翰·魏斯里·托马斯编，汉堡：克兰姆，德格鲁伊特，1957；

玛丽·C. 特尔皮：《爱默生对圣餐所作布道的贵格教根源》，《新英格兰季刊》第17期，1944，95—101页；

卡伦·里恩·卡林纳维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之兄威廉·爱默生书信》（博士论文），田纳西大学，1982；

约瑟夫·斯拉特编：《爱默生和卡莱尔的通信》，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

小亚瑟·S. 博尔斯特：《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推进真理的信徒》，波士顿：毕根，1954。

“奇迹之年”分析了超验主义者声势变大那年涌现出来的书籍、演讲和小册子。这部分借鉴了以下材料：

佩里·米勒：《超验主义者文选》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

屋大维·布鲁克斯·弗罗森汉姆：《1820—1850年间波士顿的唯一理教》，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890；

乔尔·米尔森：《康沃斯·弗兰西斯与爱默生》，《美国文学》第50期，1978，17—36页；



乔尔·米尔森：《超验主义俱乐部史》，《爱默生学会季刊》第23期，1977，27—35页；

乔尔·米尔森：《超验主义俱乐部会议日志》，《美国文学》第44期，1972，197—207页；

斯蒂芬·维切尔：《自由与命运：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内心生活》，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53；

谢尔曼·保罗：《爱默生的视角》，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 xii

小默顿·M. 谢尔兹：《自然的组成》，见于默顿·M. 谢尔兹和阿尔弗雷德·R. 弗格森主编：《爱默生的自然：其起源、形成及含义》，第二版扩版，卡本达尔：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9；

弗雷德里克·C. 达尔斯特兰德：《阿莫斯·布朗森·阿尔科特：一位学者的传记》，新泽西州，东布伦斯维克：法尔雷·狄金森大学出版社，1982；

小亚瑟·M. 施勒欣格：《天国历程：奥立斯蒂斯·A. 布朗森》，波士顿：里特尔，布朗，1966；

查尔斯·克罗：《乔治·里普利：超验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雅典：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67；

威廉·哈切森：《超验主义牧师：新英格兰文艺复兴中的教堂改革》，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9；

尼娜·拜姆：《安姐妹：伊丽莎白·皮博迪的千禧历史观》，《美国文学史》第3期，1991，27—45页；

约瑟芬·E. 罗伯兹：《伊丽莎白·皮博迪与圣堂学校》，《新英格兰季刊》第15期，1942，497—508页；

《伊丽莎白·帕尔默·皮博迪的信件：美国文艺复兴中的妇女》，布鲁斯·A. 隆达编辑并作序，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威斯赖昂大学出版社，1984。

“成规与运动”追溯了唯一理教保守派与超验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论战。超验主义者对因经济危机而力量削弱的社会宗教和政治改革的步伐缓慢日益感到不满。这部分的材料包括：

威廉·查瓦特：《美国浪漫主义与1837年的经济危机》，《科学与社会》第2期，1937，67—82页；

哈里叶特·马蒂诺：《西游回顾》（2卷本），伦敦：桑德斯和奥特利，1838；

约翰·杰伊·查普曼：《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913），第二版修订版，波士顿：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21；



埃德文·吉陶曼：《琼斯·威利：1833—1840 的有效岁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

海伦·R. 迪斯：《皮博迪家族与琼斯·威利的“疯狂”：玛丽·皮博迪的两封书信》，《哈佛文学公报》第 35 期，1987，218—229 页；

康拉德·赖特：《爱默生、巴齐莱·弗罗斯特及〈神学院讲话〉》，见《自由基督教徒》；

加里·霍尔：《爱默生与〈圣经〉：作为〈圣经〉的阐释和修正的超验主义》（博士论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89；

迈克尔·科拉科西奥：《爱默生的“致辞”的清晰争斗》，ESQ 第 37 期，1991，141—212 页；

罗伯特·哈毕奇：《爱默生的不情愿的敌手：安德鲁斯·诺顿与超验主义的争论》，《新英格兰季刊》第 65 期，1992，208—237 页；

亨利·斯蒂尔·考玛吉：《阿伯纳·尼兰德的渎神行为》，《新英格兰季刊》第 8 期，1935，29—41 页；

罗德里克·S. 弗兰奇：《波士顿从人和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830—1839 年间阿伯纳·尼兰德的自由思想运动》，《美国季刊》第 32 期，1980，202—221 页；

罗伯特·E. 博克霍尔德：《爱默生、尼兰德与〈神学院讲话〉》，《美国文学》第 58 期，1986，1—14 页；

xiii 克拉伦斯·L. F. 戈德斯：《美国超验主义期刊》，北卡罗莱纳，达拉谟：杜克大学出版社，1931；

伊丽莎白·R. 麦肯锡：《西部实验：俄亥俄峡谷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迪恩·戴维·格罗德增：《西奥多·帕克与超验主义》，（博士论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

约翰·W. 罗金森：《W. M. L. 德维特——现代〈圣经〉考证的奠基人：一部智者的传记》，联合王国，谢菲尔德，《旧约》研究杂志出版社，1992；

斯格费尔德·B. 帕克纳特：《德维特在新英格兰》，《美国哲学学会会议纪要》第 102 辑，1958，376—395 页；

佩里·米勒：《西奥多·帕克：背弃自由主义》，《哈佛神学评论》第 54 期，1961，275—295 页；

菲利普·F. 古拉：《西奥多·帕克和南波士顿圣职授任仪式：〈论基督教中短暂与永恒〉的文本交织》，《美国文艺复兴研究》，1988，149—178 页；

迪恩·格罗德增：《西奥多·帕克的基督教中的短暂与永恒，1832—1841 年》，



《唯一理教全体历史协会会议纪要》第22辑，第一部分，1990—1991，1—18页；

詹姆斯·马蒂诺：《施特劳斯和帕克》，《威斯敏斯特与国外季刊评论》第47期，1847，136—174页；

“文学与社会改革目标”考察了超验主义从一个教会改革运动发展为一个具有更大抱负的运作的过程。希望不经审查就出版自己作品的欲望促使一些超验主义者创办了自己的杂志；这些杂志又反过来对超验主义者的散文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部分的材料包括：

乔尔·米尔森：《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与〈日晷〉：寻志史及其撰稿人》，伦敦：联合大学出版社，1980；

查尔斯·布莱克波恩：《〈西方信使〉新解》，《美国文学》第26期，1954，320—336页；

戴维·鲁滨逊：《威廉·亨利·钱宁的政治冒险旅程》，《美国季刊》第34期，1982，165—184页；

卡尔·F. 斯托奇：《憎恨的快速排斥：爱默生、玛格丽特·富勒与其他人》，《浪漫主义研究》第7期，1968，65—103页；

查尔斯·凯珀：《玛格丽特·富勒：美国的浪漫生活》第1卷：《私人生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朱莉·埃里森：《微妙的主题：浪漫主义，性别与理解伦理》，纽约，伊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

乔尔·米尔森：《弗雷德里克·亨利·海吉与超验主义的失败》，《哈佛图书简报》第23期，1975，396—410页；

伯纳德·罗森塞尔：《〈日晷〉，超验主义与玛格丽特·富勒》，《英语语言笔记》第8期，1970，28—36页；

海伦·亨尼施：《〈日晷〉：其诗歌与诗歌批评》，《新英格兰季刊》第31期，1958，66—87页；

小罗伯特·理查森：《亨利·梭罗：精神的一生》，伯克莱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

谢尔曼·保罗：《美国海岸：梭罗的心灵探索》，厄卜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58；

理查德·莱博：《青年梭罗》，安姆赫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77；

沃特·哈丁：《亨利·梭罗的日子》，纽约：克诺普夫，1966；

雷蒙德·R. 波斯特：《梭罗的日记：亨利·戴维·梭罗用文献记载的一生，1817—1862》，纽约：G. K. 霍尔，1992；

罗伯特·塞特尔梅亚：《梭罗的阅读：用文献目录研究智力史》，普林斯



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

詹姆斯·迈克恩托西：《浪漫自然主义者梭罗：对自己的立场的转变》，纽约，伊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

罗伯特·塞特尔梅亚：《梭罗作品的传播对英国诗人的影响（PXV）》，《美国文艺复兴研究》，1980，239—257页。

“希冀改革”记载了一群超验主义者的渴望与失败，他们决心通过建立旨在消除痛苦、恢复社会和谐而把自己关于正义社会的理论付诸实践。这部分资料包括：

爱伦·塔克·爱默生：《丽迪安·杰克逊·爱默生的一生》，编者：狄罗斯·伯德·卡彭特，波士顿：退那出版社，1980；

卡尔·J. 伽那瑞：《乌托邦的选择：19世纪美国的傅立叶主义》，纽约，伊撒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1；

屋大维·布鲁克斯·弗罗森汉姆：《乔治·里普利》，波士顿：休斯敦，米福林，1882；

亨利·山姆斯：《布鲁克农场的自传》，新泽西，英格伍德，克利弗斯：普森提斯—霍尔，1958；

约翰·迈克列尔：《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相遇的日子》，波士顿：里托，布朗，1984；

莫里斯·贡诺德：《不安的独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作品的个人与社会》，劳伦斯·罗森沃尔德翻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

理查德·李·弗朗西斯：《环境与救世：“花果园地”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美国季刊》第25期，1975，202—234页；

贺拉斯·格利雷：《忙碌生活的回顾》，纽约：J. B. 福特，1868；

玛丽安娜·德怀特·奥维斯：《布鲁克农场的通信》，艾米·L. 里德编辑，纽约，帕夫吉普色：华萨学院出版社，1928；

约翰·科德曼：《布鲁克农场：历史与个人回忆录》，波士顿：阿瑞纳出版社，1894；

林克·C. 约翰逊：《改革者的革新：爱默生、梭罗及其在艾默里大厅的礼拜日演说》，ESQ第37期，1991，235—289页。

“各奔前程”追述了超验主义者们各自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后的情况：有的将成为职业作家和演说家，有的将成为社会改革家或者杂志人士，有的将会发现新的教会组织形式或者接受新的宗教，有的将置身外国的革命之中。这部分资料包括：

盖·R. 沃德尔：《康沃斯·弗朗西斯、超验主义者以及波士顿牧师协